

# 气化宇宙观视域下的二十四节气时间结构

林 琦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4日

## 摘 要

以中国哲学气化宇宙观为核心视域, 提出二十四节气并非人为制定的外在时间刻度, 而是气化宇宙论内在节律的时间结构化展开。文章以先秦两汉核心哲学文献为基础, 通过文本细读与结构分析的方法, 从阴阳生成机制、气化时间的本体论内涵、宇宙-伦理同构的时间性奠基三个维度, 对二十四节气的哲学结构进行系统性考察, 揭示其作为中国传统生成论时间观核心载体的本体论意义。

## 关键词

二十四节气, 气化宇宙观, 时间结构, 天人同构, 生成论

#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smology of Qi Transformation

Yu Lin

Th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22, 2026; accepted: June 14, 2026; published: June 24, 2026

## Abstract

Taking the cosmology of qi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as its core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re not external time scales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by humans, but rather the temporal-structural unfolding of the inherent rhythms inherent in qi-transformation cosmology. Based on core philosophical texts from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s of close textual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long three dimension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yin and yang, the ont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qi-transformative temporality,

and the temporal foundation of cosmo-ethical isomorphism. It thereby unveils their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as the core carrier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enerative theory of time.

## Keywords

Twenty-Four Solar Terms, The Theory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verse, Temporal Structur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The Theory of Gene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既有研究中，二十四节气的学术讨论多集中于三个维度：一是农史与历法史维度，梳理其历史演变与天文观测基础；二是民俗学维度，探讨其节庆仪式与文化遗产价值；三是泛文化哲学维度，零散论及其蕴含的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但多未深入其在中国哲学体系中的本体论根基。这种研究现状，本质上是将二十四节气窄化为农耕生产的实用工具，遮蔽了其背后深层的哲学结构。

中西哲学的根本分野之一，在于本体论与时间观的差异：西方传统哲学以实体本体论为核心，多将时间理解为独立于事物存在的形式或外在框架，例如亚里士多德将时间界定为“运动的数”，牛顿提出“绝对时间”的概念，康德则将时间视为先天直观形式；而中国哲学自先秦以来便确立了以“气化流行”为核心的生成论宇宙观，时间并非气化运动的外在框架，而是其内在节律的展开。在此问题上，张祥龙先生在其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曾以“时机化”概念揭示中国时间观的本体论特征，认为中国哲学的时间不是线性均质的流逝，而是与意义生成内在相关的“时中”之机[1]。杨儒宾先生则在气论与身体观的研究中指出，先秦两汉的气化宇宙论并非抽象的形上学思辨，而是与政治秩序、身体技艺深度交织的“具体性形上学”[2]。安乐哲(Roger T. Ames)与郝大维(David L. Hall)合作提出的“焦点-场域”式思维，亦强调中国宇宙论中“过程优先于实体”的特质。正是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二十四节气这一具体的时间制度，揭示其如何将气化宇宙论的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可分节的时间结构。此处对中西时间观仅作类型学对照，不做哲学史细密考证。由此，核心问题在于：二十四节气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气化宇宙论的时间结构化表达？

为回应这一核心问题，以《周易》《老子》《管子》《淮南子》《礼记》《黄帝内经》等中国哲学核心经典为一手文本材料，同时参考学界关于气化宇宙观与时间哲学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概念史梳理与哲学结构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辅以核心文本的细读，对关键命题的文献依据进行精准锚定，讨论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结构，而非对其进行天文历法的考据与农史梳理；对节气相关民俗现象仅作哲学内涵的延伸阐释，不做民俗学的田野与流变分析。论证逻辑从气化宇宙论的本体论内核出发，逐步揭示二十四节气如何从宇宙生成节律，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时间结构，并最终完成宇宙秩序与人间伦理的同构贯通。

## 2. 从四时到节气的演进是阴阳生成秩序的时间化分节

中国哲学的生成论内核，集中体现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之中。历来多有研究将阴阳误读为二元对立的矛盾法则，实则在中国哲学的体系中，阴阳绝非静态对立的实体，而是同一气化流行过程中相反相成、循环递进的势态，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内在动力结构。《老子·四十二章》言“万物负阴而抱

阳，冲气以为和”，明确了阴阳二气的交感运化是万物生成的本源[3]；《管子·乘马》亦谓“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直接将四时更迭锚定在阴阳的动态运化之上[4]。

阴阳生成机制的核心，是“消长转化、循环生生”。《淮南子·天文训》载“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清晰揭示了阴阳互根互用、极则必反的生成法则[4]：冬至为阴之极致与阳之开端，夏至为阳之顶峰与阴之萌动，二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循环生成的两个端点。这种生成逻辑，正是中国传统时间观的核心根基。

从四时八节到二十四节气的演进，本质上是对阴阳生成秩序的精细化分节。西周时期，古人已通过圭表测影确立“二分二至”四个阴阳运化的核心转折点；春秋中期又补充“四立”，形成“四时八节”的框架，完成了宇宙生成节律的宏观时间化。至《淮南子》完整记载二十四节气的完整体系，将阴阳运化的年度循环细化为24个连续衔接的阶段，本质上是对生成秩序的“微分式”拆解——每一个节气，都是阴阳消长的阶段性标记，是气化状态的精准定格[5]。

二十四节气的体系化进程，绝非单纯的历法技术进步，而是中国古代哲人对阴阳生成机制的认知深化，它将抽象的宇宙生成秩序，转化为一套可感知、可遵循的时间分节体系，为气化宇宙观的时间化展开奠定了基础。

## 2.1. 气的概念具有完整的谱系与丰富的多义性

“气”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但其内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哲学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层次丰富的概念谱系，此处所论的气化宇宙观，正是基于这一谱系的核心脉络展开。

先秦时期是气论的奠基阶段，气的核心内涵围绕生成机制展开。《老子》将气与阴阳绑定，确立了其宇宙本源的地位[3]；《管子》提出“精气说”，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将气视为贯穿自然万物与精神现象的共同本源[4]；《庄子》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完成了气论的本体论提升，将宇宙万物的统一性锚定于气化流行之中[6]。同时，先秦哲学已明确“形气”之分，气是无形的本源，形是气凝聚的产物，确立了“气聚成形、形散归气”的生成逻辑。

两汉时期是气化宇宙论的系统化阶段，《淮南子》构建了从“道 - 虚廓 - 宇宙 - 气 - 天地 - 阴阳 - 四时 - 万物”的完整生成链条[5]，《黄帝内经》则将气化理论与生命体系贯通，形成了天人同气的完整框架，为二十四节气的哲学阐释提供了直接的文本依据[7]。宋明理学时期，气论被纳入“理 - 气”结构中，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本体论，程朱理学则以“理”为本体、以“气”为发用，进一步丰富了气论的哲学层次，印证了气化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气化宇宙观虽然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不同形态——先秦侧重于本源性(气生物)、两汉侧重于构成性与运作性(气化流行、阴阳推移)、宋明则侧重于理气关系中的质料与动力——但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承诺是一致的：宇宙不是静态实体的集合，而是动态生成的过程。王夫之在注解张载《正蒙》时系统阐发太虚气化之理，提出“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散则隐”，明确太虚并非空无，阴阳二气充塞天地，四时流转、万物生灭皆为气之聚散屈伸的自然运化；气化兼具物质实存性与循环生生的动态节律，天地四时的秩序、万物生命的禀赋皆由太和絪縕之气所统摄[8]。这一宋明气论阐释厘清了气化流行的本体根基，为理解二十四节气作为气化节律的时间化表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气的概念谱系的演进，始终围绕宇宙生成与天人贯通两大核心展开，这一脉络为二十四节气的本体论阐释提供了坚实的概念基础，也让讨论具备了完整的哲学史依据。

## 2.2. 时间的本质是气化流行的内在节律

在气化宇宙观的框架中，时间的本质绝非外在于事物的线性容器，而是气化流行本身的内在节律，是宇宙生成过程的内在展开。

中国哲学中，时间与气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没有脱离气化的时间，也没有脱离时间的气化。《周易·系辞上》言“生生之谓易”，宇宙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生成过程，而时间正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直接呈现[9]。阴阳二气的消长、转化、循环，本身就具有时间性：阳气的萌动、上升、鼎盛、收敛，阴气的潜藏、生发、鼎盛、回落，这个动态过程本身就是时间的流逝，时间不是这个过程的外在载体，而是这个过程本身。

这种时间观，是循环的、生生不息的生成时间观。时间不是从过去到未来的单向不可逆流逝，而是阴阳气化循环往复的生成过程，每一次循环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新的生成的开端，这正是中国传统时间观的核心特质。张祥龙先生在其研究中，将这种时间观称为“时中”或“时机化”时间，认为它不同于西方哲学中作为“容器”或“数列”的时间，而是与具体情境中的意义生成内在相关[1][10]。在张氏看来，中国哲学的时间从来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道”或“气”在具体情境中的呈现方式。正是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二十四节气正是这种“时机化”时间观的最具系统性的制度化表达——它将气化运行中的每一个关键“时机”，以节气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一套可操作、可预期、可传承的时间分节体系。

气化宇宙观从本体论层面重构了时间的本质，将时间从外在的容器转化为气化流行的内在节律，这一核心命题，是理解二十四节气哲学内涵的本体论根基。

### 2.3. 二十四节气是气化运行的节律标志

基于对气化与时间本质的理解，提出核心命题：二十四节气不是人为刻画在时间容器上的外在刻度，而是对气化运行内在节律的精准捕捉与标记，是气化宇宙观的具象化时间形式。

二十四节气的划分虽以天文观测为基础，但其核心指向是对气化状态的把握。天文现象是气化运行的外在表现，物候变化是气化运行的具象呈现，而节气的本质，是对气化运行内在节律的标记。这一点从节气的命名中便得到充分印证：立春是阳气突破阴寒、气化从闭藏转向生发的开端；雨水是阳气升腾、气化从固态冰寒转向液态润泽的转折；惊蛰是阳气振发、气化动势显著增强的节点；清明是阳气纯和、气化畅达清朗的状态；谷雨是阳气充盈、气化润泽之力达到顶峰的时段。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每个节气对应的“三候”，更是气化状态的直接具象化。比如立春三候“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陟负冰”，完全是阳气萌动、气化回升的过程呈现：东风是阳气的载体，解冻是阳气融化阴寒，蛰虫始振是阳气唤醒地下的生命，鱼陟负冰是阳气渗透水中、带动生命向上。每一个物候变化，都是气化状态变化的直接结果，而节气，正是对这些气化变化节点的精准定格。

二十四节气的本质，是气化运行节律的时间化标记，它将抽象的气化生成过程，转化为一套可感知、可遵循的时间结构，完成了气化宇宙观从本体论到具象化时间形式的转化。

## 3. 宇宙 - 伦理同构构建了二十四节气的伦理结构

二十四节气所标记的气化节律，不仅是对宇宙生成秩序的时空呈现，更从本体论层面贯通了天人之际，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伦理结构。本章将从四个递进的层面展开论证：首先阐明天人同构的本体论根基，继而分析月令政治如何将宇宙节律转化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奠基，再考察顺时养生对个体生命时间伦理的确立，最后揭示生成理性作为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实践智慧。由此呈现二十四节气如何从宇宙论时间结构，转化为贯通政治、伦理与个体生命的实践性时间伦理。

### 3.1. 天人同构拥有坚实的本体论根基

既有研究多将二十四节气中的“天人合一”理念简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则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本质是天与人在本体论层面的同构性——人与天地万物都源于同一气化流行，因此具有同源、同构、同律的本质关联。

《庄子·知北游》提出“通天下一气耳”，明确了天人同构的本体论根基：天与人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同一个气化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共享同一个本源，遵循同一个气化节律[6]。《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命题，本质上揭示了人、地、天、道的同律性，人作为气化流行的产物，其存在与活动必须遵循天地气化的根本节律。《周易·乾卦·文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里的“合”，不是外在的和谐，而是本质上的同频共振，是人的行为与宇宙气化节律的内在契合[9]。而二十四节气，正是这种“与四时合其序”的具体实践框架。

安乐哲与郝大维在阐释中国宇宙论时，曾提出“互系性”(correlative thinking)这一关键概念，认为中国哲学中的天、地、人、物并非独立实体，而是在一个动态的、相互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彼此界定[11]。在他们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拒绝西方哲学中常见的“二元对立”与“单一直线因果”，而是强调一切存在者之间内在的、循环的、相互映射的关联。二十四气体系正是这种“互系性”思维最典型的时间制度体现：它并非将时间视为独立于事物的抽象框架，而是将阴阳、四时、方位、物候、政令、身体、伦理编织进一个相互感应的整体网络之中。正是在安乐哲“互系性”宇宙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二十四节气如何通过“分节”操作，使这种抽象的网络关系获得了可操作的时间标尺。

天人同构的本体论根基是通天下一气的气化宇宙观，这为二十四节气从宇宙节律向人间伦理的贯通，提供了本体论的合法性。

### 3.2. 月令政治为政治秩序提供了宇宙论奠基

二十四节气所构建的宇宙-伦理同构，首先体现在政治层面的“月令政治”模式，其核心是将人间的政治秩序嵌入宇宙的气化节律之中，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对天道节律的遵循，而节气正是天道节律的时间化呈现。

《礼记·月令》系统构建了这一模式，其中孟春之月(对应立春、雨水节气)的禁令最具代表性：“是月也，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麝，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这段文本绝非简单的环保禁令，而是一套完整的宇宙论政治逻辑：孟春之月阳气始生，万物萌动，此时的核心气化节律是“生”，禁止伐木、杀胎、用兵等杀伐行为，本质是顺承春气的生发节律，避免破坏宇宙的生成秩序；而同期要求的“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则是与春气生发同频的德政[12]。这种顺时施政的逻辑，将政治行为与气化节律深度绑定，为政治秩序提供了宇宙论的奠基。

《管子·四时》言“不知四时，乃失国基”，明确将掌握四时气化节律视为治国的根本[3]；董仲舒进一步提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将庆、赏、罚、刑四种政治行为，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气化节律对应，构建了完整的宇宙-政治同构体系[13]。

二十四节气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宇宙论的时间标尺，它将人间政令纳入宇宙的生成秩序之中，构建了政治秩序与气化节律同构的时间伦理。

### 3.3. 顺时养生确立了个体生命的时间伦理

二十四节气所构建的宇宙-伦理同构，同时渗透到个体生命的层面，构建了一套个体身心与宇宙节律同频共振的时间伦理，其核心文本依据是《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

《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言：“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这段文本的核心，绝非简单的春季养生技巧，而是“身体气机与天气气机同构”的时间伦理：春三月对应立春到谷雨的六个节气，此时天地气化的核心是“发陈”，也就是阳气生发、推陈出新，个体的生命节律必须与这种气化节律同频——夜卧早起是顺阳气的生发，广步缓形是让身体气机舒展，以使志生是让情志与春气的

生发同步，甚至连“生而勿杀”的情志要求，都是对春气生发节律的顺应。违背这种节律，就会“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直接损伤个体的生命之气[7]。

杨儒宾先生在《儒家身体观》等著作中，曾深入分析中国哲学中“身体”与“气”的内在关联，指出中国传统的身体不是封闭的、原子式的个体躯体，而是一个“与天地万物相贯通”的气化身体[2]。在杨氏看来，这种身体观的核心特征是“可转化性”——身体的气机可以通过修炼、节律调整与天地的气化节律达成同频共振。这意味着，二十四节气正是这种“气化身体观”的时间化操作方案：顺时养生不是经验性的保健技巧，而是通过对节气所标记的气化节律的主动顺应，使个体生命成为宇宙生成过程的有机参与者，而非外在的旁观者或对抗者。

这套顺时养生的逻辑，贯穿了全年的二十四节气，从春三月的生发，到夏三月的蕃秀，秋三月的容平，冬三月的闭藏，本质上都是要求个体的身心节律，与节气所标记的气化节律同频共振，这正是“天人合一”在个体生命层面的具体实践。二十四节气将宇宙气化节律延伸到个体的身心层面，构建了个体生命的时间伦理，完成了从宇宙秩序到个体生命秩序的贯通。

### 3.4. 生成理性彰显了二十四节气的实践智慧

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核心实践智慧，是对“道法自然”理念的完美践行，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成理性。所谓“生成理性”，是一个尝试提炼的分析性概念，用以概括中国生成论哲学传统中所蕴含的独特的实践智慧形态。其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以“过程”而非“实体”为理解世界的基本单位；第二，以“顺应”而非“控制”为实践的根本取向；第三，以“节律同频”而非“目的-手段计算”为行为的合理性标准。生成理性不同于现代性语境中以控制、征服自然为核心的工具理性，也不同于强调抽象法则推演的纯粹理论理性，而是一种嵌入具体情境、尊重事物本然生成节律、以“辅助”而非“主宰”为宗旨的实践理性形态。

《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万物“自己如此”的本然生成节律，“道法自然”的核心，是顺应万物的本然规律，辅助其自然生成，而非以主观意志妄加干预，也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种实践智慧在儒家传统中同样有深刻体现，孔子“使民以时”、“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主张，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的论述，都是生成理性在政治与伦理层面的具体表达[14]。生成理性因此并非道家独有的观念，而是贯通儒道两家的、中国哲学共通的时间性实践智慧。

二十四节气正是这种生成理性的客观标尺。在农业生产中，节气所标定的农时，正是农作物生成的本然节律，在政治治理中，月令模式将生成理性转化为“顺时施政”的制度安排；在个体修养中，顺时养生将生成理性落实为日常的身心节律。与工具理性追求对自然的最大化控制不同，生成理性追求的是人与天地节律的同频共振，是融入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成过程之中。二十四节气所提供的，正是一套使这种“融入”成为可能的、可操作的时间标尺。

生成理性作为核心理论工具，其分析效力在于：它不仅能够统摄二十四节气在农业、政治、养生等不同领域的应用逻辑，揭示其共同的结构特征——顺应气化节律、辅助自然生成；同时，它也为理解中国哲学中“天道”与“人事”的贯通关系，提供了一个中层的理论概念，避免了要么停留于抽象本体论、要么陷入经验性描述的两极困境。

## 4. 总结

在气化宇宙观的本体论框架下，对二十四节气的结构进行了系统性的哲学阐释。通过回溯阴阳生成机制与气化流行的宇宙论基础，可以看到，二十四节气并非附着于农耕社会的经验性时间制度，而是生成论宇宙观在时间维度上的结构性展开。它将抽象的阴阳消长与气化运行转化为次第有序的时间节

律，让宇宙生成规律具备了可感知的具象时间形态。在这一意义上，节气不是外在时间容器上的刻度划分，而是气化运行节律自身的阶段性显现，时间亦不再是独立于存在的抽象框架，而是生成过程本身的动态展开。

与此同时，节气所确立的时间秩序并未停留于宇宙论层面，而是通过“天人同构”的结构逻辑，将气化节律贯通于政治实践、伦理规范与个体生命节律之中，形成一种宇宙-伦理同构的时间结构。政治之顺时施政、个体之顺时养生，皆以内在的气化节律为尺度，从而使人间秩序嵌入宇宙生成秩序之中。所提出的“生成理性”概念，正是对这一贯通逻辑的理论提炼：它揭示了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不是经验性的技术规则，而是一种以“顺应节律、辅助生成”为核心特征的理性形态。二十四节气由此成为连接宇宙论与实践智慧的时间枢纽，呈现出中国哲学生成理性的典型形态。

在更为广阔的思想视野中，二十四节气所体现的循环生成时间观，与现代性语境下以线性进步为核心的时间意识形成张力。它提示时间并非单向度的推进，而是气化往复、生生不息的生成过程。这种时间理解为反思当代社会的时间焦虑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不同于工具理性的思想路径。二十四节气因此不仅是一种传统制度形态，更是一种关于时间、存在与实践关系的哲学表达。

### 参考文献

- [1] 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2] 杨儒宾. 儒家身体观[M]. 北京: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1996.
- [3]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 楼宇烈,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4] 黎翔凤. 管子校注[M]. 梁运华,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5]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冯逸, 乔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6]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7] 龙伯坚. 黄帝内经集解[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 [8] 张载. 张子正蒙注[M]. 王夫之,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9] 郭彧. 周易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0] 张祥龙. 先秦儒家哲学九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Ames, R.T. and Hall, D.L. (1987)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2]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3]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4]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